

国际经济关系学

（第二版）

主编：王健
副主编：李海江、王健、王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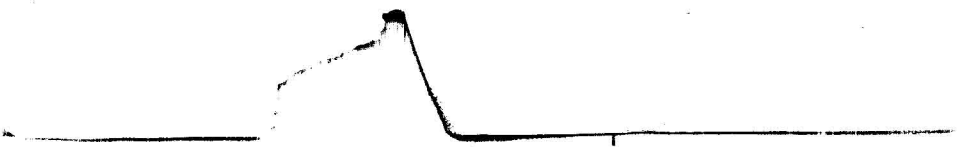
A

国际经济关系学

〔美〕J·E·斯贝茹著

储祥银 李同忠 谢 岷 译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国际经济关系学

储祥银等译

柳熙图校

责任编辑 孙希光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街北口北土城 邮政编码 10001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3.625 插页3 字数31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3.15元

ISBN 7—81000—166—3/F·045

译者的话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不少人或是从国际政治方面，或是从国际经济方面孤立地予以分析，忽视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本书作者把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起来探讨了国际经济关系中一系列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政治因素对经济关系的影响问题；西方相互依存经济体系的管理问题；南北经济体系中南方对北方的依附问题以及东西方经济体系的相互独立问题等。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和前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国际交往。

《国际经济关系学》是到目前为止较为完备的一本阐述国际经济关系各个方面问题的教科书。书作者斯贝茹博士资历丰富、学识渊博，现任美国捷运公司管理国际事务的副总裁。在此以前，她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美国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大使。本书内容详实、例证丰富、分析透彻、说理有力，是一本难得的好教科书，国外不少大学都曾以此书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校国际经济合作系也以本书作为国际经济关系课的教学参考书，试用期间，教学双方都认为此书在我国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供国际政治

与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学生和实际工作者参考。有鉴于此，我们将此书译出，以飨读者。当然，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偏见，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未及一一注出，读者参阅时应加注意。

本书由储祥银译导言、第一、二、三章；李同忠译第四、五、六章及前言；谢岷译第七、八、九章及结束语；储祥银、李同忠合译第十章。柳熙图先生审阅了本书译稿，特此表示感谢。

囿于译者的水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前 言

《国际经济关系学》第一版出版于1979年。该书的撰写是为了填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的一项空白——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之间的交叉领域。自1977年以来，这个缺口已经缩小，尽管还没有弥合。虽然尚在形成阶段，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已经以一种崭新的、越来越引人注目的面目出现于政治科学舞台。在一些专业性书刊上，就有关国际经济关系问题所作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越来越多。虽然填补缺口的主体工程是由研究政治学的学者承担的，但有迹象表明，经济学家也在尝试将政治方面的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分析之中。与此同时，人们还将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灌输给新一代的各科大学生，要求他们学会使用并融汇贯通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工具。

1977年以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加速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进程。首先，当前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加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色彩。不断出现的美元问题，世界性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国际石油危机以及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所有这一切同其他许多世界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学术界不得不对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研究的做法进行反省。

第三版《国际经济关系学》对第二版中的分析重点和组织结构未作任何改动。研究西方体系中的相互依存问题、南北体系中的南方依附北方问题以及东西方体系中的相互独立

问题，在我看来，依然是了解国际经济关系的不二法门。我所增加的只是一些既能反映学术变化又能反映1977年以来发生的各类事件的新资料。

本版还反映了我职业体验的新内容。1977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政治学副教授；1980年，本书第二版发行时，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大使；现在，我是美国捷运公司管理国际事务的副总裁——我于1981年加入该公司，因此，在我过去作为教授、政府官员的履历表上，又加进了公司官员这一新内容。作为公司官员，我又从实用主义这一角度对贸易、货币和投资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由于本书是借我在学术界、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经历而写成，运用的多是三维分析方法，所以，我相信，它肯定会有助于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当然，除我本人的经历外，本书的出版还应归功于许多他人的贡献。我非常感谢托马斯·戴斯洛克和大卫·罗茨，他们的研究工作使我受益非浅；还有杰夫·富雷顿，他审阅了我的全部手稿。我特别要感谢凯瑟林·葛文、理查德·澳泊林、约翰·卡尔伍雷和阿曼德·梯洛森，他们为本书提供了精辟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我的助手爱尼达·克罗斯，她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麦克和我的两个儿子杰森和本杰明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容忍。

目 录

译者的话

前言

导言..... (1)

第一篇 概论 (23)

第一章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关系管理..... (23)

第二篇 西方体系 (32)

第二章 国际货币管理..... (32)

第三章 国际贸易与国内政策..... (91)

第四章 跨国公司与管理问题 (132)

第三篇 南北方体系 (175)

第五章 南北方体系及其变化的可能性.....(175)

第六章 援助的使用.....(186)

第七章 贸易战略.....(234)

第八章 管制跨国公司 (290)

第九章 石油和卡特尔的势力..... (312)

第四篇 东西方体系 (369)

第十章 东西方经济关系 (369)

结束语 (420)

导 言

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从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到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一直都在同它打交道。然而，在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忽略了。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与理论中，政治与经济被相互分离和孤立起来，尽管现实并非如此。

从当代西方学术理论遗产中可以找到这种政治与经济割裂的原因。这一对当代政治与经济研究产生极大影响的理论遗产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它对人为地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它抛弃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统一的观点，代之以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首先，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些经济过程都依据自然法则运行。他们还认为，在这些经济法则和经济制度中有一种自然的协调机能，当经济自主运行，政治当局极少干预时，这种自然协调机能功效最佳，并且对社会所有方面有利。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行为看成是私有企业的势力范围，而不是政府的活动领域。

其次，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包括权力、影响和公共决策。他们断言：政治不同于经济，没有自然法则可循，也没有内在的协调一致性。政治是无法避免的。政府必须提供防卫、

法律和秩序等重要的社会服务。但是，正因为如此，政府和政治不应该干预自然的经济秩序。确实，在国际体系中，自由主义者就是希望和平而和谐地将政治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各国间能天然而和谐地进行自由贸易，如此不仅带来繁荣，而且各自相安无事。

这种理论上的割裂导致了当代学术的专门化，而学术专门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理论上的割裂。自十九世纪以来，经济学和政治学按照各自独立的学科发展，讨论各自不同的问题，而一些相互交迭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分割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在许多地方，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国际经济过程和经济政策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而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则在研究国家间关系时有意避开了对经济问题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两大政治、经济事件更强化了这种分析内容的正式分离。二次战后初期，主要世界列强达成了一项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协议。在西方，国际经济管理的布雷顿森林制度为主要工业国家间的商业、金融关系确立了规则；在东方，苏联在东欧霸权的确立为一个隔离但又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基础。而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仍处于从属地位。由于同西方发达国家保持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属地关系，它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默认它们面临的现存国际经济制度。作为公从的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和规则的结果，经济问题上的冲突被抑制到最小程度，国际关系中经济方面的意义似乎也降低了。尽管经济事件也时有发生，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英镑一再贬值等，但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被降低到了“低政治”的水平。

另一导致国际经济关系降级的因素是冷战的出现。决策者和观察家们首先考虑的国际关系问题是安全问题，比如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苏联核能力的发展、德国的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核战略、朝鲜冲突、越南以及小范围内的战争问题。因此，国际关系分析集中于一些似乎是“高政治”的问题，集中于安全以及与安全有关的问题，系统分析、决策理论、战略与博弈理论、模拟、冲突解决等都是以安全问题第一为基础的。

然而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削弱了把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分析割裂开来的基础。决定战后数十年国际政治研究内容的特定背景——经济上的意见一致和持续的军事紧张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苏分道扬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联系日趋松散，五十年代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局势已被一个更为灵活的国际体系所代替。东西方缓和虽然时有起伏，但美国和西欧已不再全神贯注于军事安全问题了。七十年代中，美国和苏联都显示出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冷战的紧张程度有所缓解。西德的东方政策（或绥靖主义）、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达成的欧洲安全协议大大减轻了东欧不稳定的压力。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结束了，欧洲国家完成了放弃原有殖民地统治的痛苦过程。发达国家的和平终于来临。

与此同时，随着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公认的经济规则已灰飞烟灭。在西方，布雷顿森林管理体系瘫痪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和自由移动的国际资金市场的扩展都使得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朝着非一体化方向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贸

易的活力、周期性经济衰退以及高涨的通货膨胀都严重威胁着现有的商业关系。新的国际生产模式向传统经济政治秩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在东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发现他们的封闭性制度限制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正在转向西方市场谋求贸易与技术，中国也显露出扩大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愿望。在南方，新的、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新的经济问题和新的经济要求投身到世界舞台中来。这些国家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他们将如何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一些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南朝鲜经济发展势头很旺，威胁着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敏感部门，一些南方国家带着他们新发现的石油财富出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他们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受害者，他们中间的多数都面临着一些影响发展的障碍。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富国和穷国间的国际关系。因此，战后经济舆论看法并不一致，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同时并存，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

所以，如果理论和分析与实际结合起来，就必须把经济和政治沟通起来，就必须探讨国际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本文将验证经济政治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国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经济。

国际政治的政治动力

研究过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几乎总是从经济现实如何影响政治方面进行分析。比如，有一种思想认为：经济实力决定了战略、外交实力。分析家们指出一国

的国民生产总值、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地位等决定了该国的军事实力。这一思想说明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极为重要。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早期工业化是英国政治实力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英国在当时国际经济政治结构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重要支柱。同样，美国的经济实力对于美国在二十世纪中不断增强其军事、政治的统治地位极为重要。

如同经济因素影响政治一样，政治因素也会影响经济。然而，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常常会忽略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可否认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本文将着重探讨问题的另一方面，而且是常常会被忽略了方面：国际经济中的政治活力。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体系影响经济体系，因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与运行；第二，政治关系影响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常常受到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的支配；第三，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关系，因为，同国际政治的相互影响一样，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只是各国官方或非官方人员成功地或不成功地解决相互矛盾冲突的过程，只是他们为达到其共同的目标而成功地或不成功地进行合作的过程。现在让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国际经济中这三个政治方面的问题。

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

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与运行。通观当代历史，生产、分配和消费都受到外交和战略因素的影响。

在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阶级，经济的相互影响具有两大政治特点。第一是中世纪宇宙神教与地方特殊神宠论破灭后，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国家与民族，一些新的集权政治单位——英格兰、法国、西班牙、瑞典、普鲁士、俄罗斯。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巩固政权，包括与地方权力结构相对应的对内权和与其它国家相对应的外外权。第二是在重商主义政治制度下，许多势均力敌的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权力分配相当平等，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面权力地位来说，相对较小的变化也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尽管存在着权力之争，这种竞争仍然是有一定节制的，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包括对皇家合法性的统一认识。国家能力也有限制，国家管理虚弱，军队很少，而且是雇佣的。军事的和外交的目标因此而受到限制。

重商主义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意义十分深远。经济领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追求国家权力通过追求国民经济权力和财富来实现，权力之争受到政治现实的限制，争夺的过程被解释为经济竞争，对所有国际经济交往都实行控制，并带有维护国家政权的意图。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权力是与拥有贵金属密不可分的。因此，政府为了达到保持贸易顺差，进而积聚贵金属的目的而组织对外贸易，安排国际贸易结构，对交易市场和贵金属的国际移动严加控制，并通过关税、配额以及对一些交易实行禁令的办法来管理个人的和一般的商业交易，国家向出口产业和进口替代产业提供补贴，有时国家甚至直接参与生产或贸易。

为了达到保持贸易顺差的目的，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政治目的，重商主义国家还占有的一些殖民地。殖民地的存在是

为宗主国重商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对殖民经济施行严格的国家管理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正是作为对这种重商主义政策——对生产、出口、进口的管理以及对运输的控制等——的反抗，美洲殖民地起来反对英格兰。

因此，在重商主义时代，正是国家的出现以及国家本身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相互作用，而且，一旦那种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一旦大英帝国上升到政治统治地位，经济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十九世纪中，欧洲大陆力量的均衡与大英帝国海外权力的扩张构成了当时政治体系的两大特点。在大陆上，俄罗斯和法国受到维也纳大会领土再分配的限制，四大主要大陆强国都受到他们各自竞争对手的控制，这使得大英帝国得以发挥平衡和调解的作用。由于其远离欧洲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临近沿海的有利条件，大英帝国能够采取不承认大陆国家海外殖民地的方法来控制欧洲大陆进入世界其它地区。英国的海军力量，以及欧洲大陆其它列强力量的削减意味着较大部分的非欧洲世界属于独立地区或属于英国的管辖地。

由于欧洲大陆力量的均衡和英国海外权力的扩张，大英帝国的经济领先发展，并得以建立起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政治根源可以追溯到拿破仑一世时期，当时法国皇帝强制推行了大陆制度，对大英帝国实行经济禁运，拿破仑一世的禁运使得英国得以从与大陆的贸易转向与海外进进贸易。法国失败后，禁运结束，英国仍然按照原来的方向前进。随着谷物法、航海法的废除和关税的逐步削减，英国建立起一个以国内制成品交换海外原材料的经济体系。同欧洲其它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使得这种经济体系

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的海外投资更加巩固了其贸易统治地位。十九世纪中，大量资本从英国流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帝国管辖下的非热带地区，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因此，在十九世纪中，英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得以选择了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得以将这一体系向世界推广。但是，又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十九世纪末英国实力衰落，国际政治体系开始发生变化时，自由经济体系也开始走下坡路，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体系。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难以捉摸。但是，有两大政治因素对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因素是英国统治地位削弱，其它政治、军事、经济列强，特别是美国 and 德国兴起，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第二个因素是这些新列强的破坏性影响由于出现了当代民族主义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民族特性、民族自尊、民族自我完善与权力追求的力量势不可挡，激励着日益强大的竞争性国家，当然也激励着英国。较为势均力敌的国家关系和新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日趋摆脱大英帝国的控制与海外统治，而英国的控制与统治正是十九世纪早期整个体系的稳定因素。

这些政治变化使其它力量得以发挥作用：同军事力量一起，新兴强大的资产阶级施加的政治压力；各类冒险家（探险家和追求有钱女子的男人）的越轨行动；为海外领土控制提供便利的技术、通讯进步；充满活力的帝国主义竞争行为和反行为。国际政治冲突加剧了，但这些冲突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是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至少在1914年以前是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亚洲的大部分，以及最终非洲的全部被西欧

和美国瓜分了。

这一新帝国主义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欧洲的政治统治导致了经济统治和经济剥削。如同在重商主义时期一样，殖民地被纳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服务于宗主国的经济利益。政治上的胜利者控制了投资和贸易，管理着货币和生产，操纵了劳动力资源，在他们的殖民地中建立起一个依附型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持续的时间远比对这些殖民地实际政治统治的时间长得多。

西方帝国主义体系和英国残余统治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续冲击下最终崩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其基础是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敌对，这一新体系中的两极在政治上具有截然相反的性质。西方，以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为主，加上西欧和日本组成了一个集团，第三世界中，许多国家仍然在政治上从属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东方，苏联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占有压倒优势。最终，在冷战中东西双方互相对峙。

国际政治体系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因为政治的原因，东西双方相互隔离，建立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方，苏联强制推行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联邦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因为政治原因，这一体系试图使社会主义联邦中其它成员国在经济上依附于苏联，而同西方隔离开来。西方，美国的军事政治主导地位是与其经济主导地位相一致的，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着西方的经济秩序。如同英国霸权时代一样，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仍表现为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中，美国的贸易、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元都居于支配地位，所以说在战后政治影响了经济。跟以前一样，七十年代中正是不断变化的政治因素导致了战